

## 图管局童书风波凸显公民社会难面面俱到 上一堂包容课

黄伟曼

联合早报, 2014年8月3日

上个月发生的国家图书馆三本英文童书下架事件, 是最新一起涉及公共机构的社会纠纷。

社会学者、政治观察家与公民社会组织代表受访时都指出, 事件反映公共机构和政府在卷入对立各方互不妥协的纠纷时, 面对的必是两难局面。

多数受访者都同意, 即使公共机构在各项课题上有必要坚守政府的立场, 它在面对群体对立事件时必须更敏感, 同时也更清楚地进行沟通。

当两个孩子发生纠纷, 父母应该选边站、当协调者, 还是静观其变?

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郑宝莲副教授谈到近年来较频密发生的群体利益冲突时, 以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动比喻, 说明政府和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微妙关系。

郑宝莲认为, 每个家庭中的兄弟姐妹偶尔会有摩擦, 身为父母, 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能被视为偏袒任何一方。“但在现实生活中, 这非常难。你想当好父母, 但孩子都看对方不顺眼, 怎么办? 就如当父母的要解决这问题一样, 政府要继续执政, 也必须学习如何通过考验。”

### 政府不能回避公民社会纠纷

上个月发生的国家图书馆童书下架事件, 是最新一起涉及公共机构的社会纠纷。社会学者、政治观察家与公民社会组织代表受访时都指出, 这起事件反映一个公共机构和政府在卷入一场对立各方互不妥协的纠纷时, 所面对的两难局面。

图书馆在接到家长投诉后, 以图书违反“亲家庭”的政策为依据, 从儿童读物区撤下了三本涉及同性恋的英文儿童书籍, 引发了这场风波。反对撤书的群体, 除了支持同性恋权益与价值观念者之外, 也包括不满图书馆处理撤书方式的民众。通讯及新闻部长雅国博士当时以“图管局是根据主流社会规范做决定”加以说明, 得到一方的赞扬, 但也受到另一方质疑公共机构扮演“道德警察”的正当性。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黄奕鹏博士认为, 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插手管理, 尤其当公民社会还未成熟、各方协商的原则未建立起时, 政府不得不担负起“仲裁者”的责任。他以较早前有维护传统家庭体制的宗教团体反对同性恋群体举办“粉红点”(Pink Dot)集会的事件为例说: “局势如果一直僵持下去, 而政府只选择退居二线, 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 多数受访者都同意, 即使公共机构在各项课题上有必要坚守政府的立场, 它在面对群体对立事件时必须更敏感, 同时也更清楚地进行沟通。

### 政府须以最适当方式代表所有新加坡人

亚细安人权机制新加坡工作组(MARUAH)主席布蕾玛(BraemaMathi)批评说, 图管局相信是一开始并没有搞清楚自己的立场, 才会发生已在架上的童书突然撤下, 之后又放回的事件。

她说：“只要清楚新加坡是个世俗社会，以及‘亲家庭社会’这个政府立场，并制定清楚的程序，在决策方面贯彻这两个原则，当初可能就不会有这种矛盾。”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建议，各个公共机构应针对不同课题设立公民咨询委员会。她说：“公共机构不是中立的个体，它负责管理某个民众关心的课题范围，必须采取执政政府的立场，但尽管如此，人们现在希望政府多与民联系，各个机构也应针对一些特定的课题，开放让民众辩论与讨论。”

郑宝莲认为，每个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都必须有所取舍和平衡，而政治职务者面对越来越艰巨的挑战。她说：“政府的问题是，它一方面必须是人民的道德指南针，而我也认为这是很崇高且应当秉持的理想。另一方面，它也必须自问，应以谁的标准设定道德准绳？”

她指出，每个政治职务担任者必然有自己认同的道德标准；当人民在选举中投选某个候选人时，大家希望这个人能代表人们想要看到的社会价值观和信念。“政府无法舍弃它作为道德指南的责任，但它必须思考如何以最适当的方式代表所有新加坡人。”

### **社会出现新裂痕？ 学者：应提防单一课题主导政治**

郑宝莲指出，新加坡社会正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人民所关心的事物已超越三餐温饱与社会稳定等课题，希望获得更多公民自由。尤其当人们现在对于包容社会的定义逐渐扩大，超越大家原本所熟悉的种族与宗教范围时，公共机构在决策时应考虑，政策是否会导致某个少数群体遭排斥。

### **郑宝莲：近期争端牵涉新移民与性倾向课题**

根据郑宝莲的观察，社会近来浮现的争端多围绕两个课题，即国人与新移民或外来者的对立，以及人们对于性倾向的不同立场。她指出，社会日趋多元的现实不应被忽视，除了同性恋群体之外，单亲家庭与单身人士等“少数群体”的声音会越来越大，而这次童书下架事件就凸显这一点。

她说：“当你相信包容社会的理念时，就不能只接纳一些群体，而把其他群体排除在外，一旦立场不清晰，那就说也说不清。”

### **学者：社会裂痕早已存在**

作为多元种族与宗教国家，语言、种族与宗教课题向来是新加坡的敏感课题，也常被视为可能导致社会分化的传统断层线（fault lines）。不少受访学者指出，人们针对移民与性倾向课题的分歧显示社会似乎出现新裂痕。

文化评论员、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讲师纳斯里博士（NazryBadawi）认为，种种迹象显示裂痕早已出现，只是最近才凸现。

然而，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指出，不应过早认定意见的分歧即代表一种社会裂痕。“这是社会多元化与逐渐成熟的现象，尤其当社会重视其包容性与多元性时，各方矛盾难免会显得较为尖锐。”

他虽相信新加坡人民不会根据社会上的单一事件来评估政府或执政党政绩，但他也警惕，应提防单一课题主导政治的可能性。

议员哈里古玛指出，选举中根据单一课题投票的选民可能越来越多，这是不健康的发展，人们不应该忽略执政党政府的整体及长期表现。他说：“选民一旦觉得课题十分重要，很可能会影响投票决定……但政府将无法在每项课题上满足所有人甚至是大部分人。人们应该根据执政党政府的整体及长期表现进行评估，并将之与其他政党做比较。”

### 国会将讨论修订《动物与飞禽法令》政府能与公民社会组织有效协商

在政府去年接受保护动物福利团体等民间代表所提出的全部24项建议后，多名议员下个月也将向国会提出个别议员法案，修订《动物与飞禽法令》，提高本地动物福利的标准。对于关爱动物研究协会（Animal Concern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Society，简称ACRES）执行理事长黄国光来说，这是公民社会组织多年来与政府磨合后，取得的亮眼成果。

在特定课题上，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是否能展开有效协商，相互妥协，往往可扭转负面的局面。一些学者受访时指出，在动物权益与环境保护方面，本地公民组织已寻找到很好的平衡点，有别于对政府持敌视态度的群体，它们懂得如何进退，是“特别的例子”。

黄国光指出，在推动动物权益方面，能有今天的共商和协作模式，除了因动物福利组织几十年来累积了与政府互动的经验，主要也因政府当中主要的决策者近来积极地领导改变，更愿意与各个组织进行讨论，其他机构也应效仿这做法。

他建议，公民社会组织也应该尝试退一步，探讨如何提供更具建设性的反馈，以促进合作。“我们以往也总是和政府对立，但现在我们都参与决策过程，经协商后的结果大家都更能够接受。”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观察说，在动物权益与环境保护方面，政府与利益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已趋一致，政府也开始了解动物福利课题的重要性。“双方现在都能够遵守一套已制定好的互动规范，也接受这样的规范。”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黄奕鹏博士则认为，环境保护组织是公民社会可达到一定成熟度的最佳例子。“他们现在若反对某项发展工程，与政府之间有观念的冲突时，已找到与政府协商的方式。”

· 国大社会学系副主任郑宝莲副教授：政府无法舍弃它作为道德指南的责任，但它必须思考如何以最适当方式代表所有新加坡人。

·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许林珠博士：人们希望政府多与民联系，公共机构应开放特定课题让民众参与讨论。

· 亚细安人权机制新加坡工作组主席布蕾玛：图管局相信是一开始并没搞清楚自己的立场，才会发生下架后又放回的事件。

· 国大政治系副教授黄奕鹏博士：当公民社会还未成熟、各方协商原则未建立时，政府不

得不担负起“仲裁者”的责任。

-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当社会重视其包容性与多元性时，各方矛盾难免会显得较为尖锐。

- 议员哈里古玛担心在选举中根据单一课题投票的选民可能会越来越多。他认为，人们应该根据执政党政府的整体及长期表现进行评估。